

福建漳州市客家文化研究联谊会 编

海峡客家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峡客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8(时代文化丛书)

ISBN 7-5073-1827-3

I.海... II.萧... III.客家研究—当代—文集
IV.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2823 号

海 峡 客 家

主 编:萧 彪

责任编辑:杨玉文

装帧设计:林群声 张脉峰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刷装订:北京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 印张

字 数:380 千字

印 数:1000 册

版 次: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34-1827-3/K · 1205

定 价:32.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序

孔永松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间政治、经济各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引发了海外客家人回国回乡探亲、寻根、祭祖的热潮，随后便出现了“客家学热”。十几年来，客家学刊物相继创办，客家学著述相继问世，客家学研究硕果累累。漳州市客家文化研究联谊会结集出版的《海峡客家》，当属这股热潮催生的一部客家学研究著作。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这是一个有益的工作。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根据有关资料所述，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约有一亿人之多。在中国大陆主要散居于南方和西南各省区，最聚集的当属闽、粤、赣交界处。在台、港、澳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在海外的东南亚各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也有不少客家人。客家文化的第一源流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客家先民多为中原的“衣冠士族”。从四世纪晋朝开始至 19 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 1500 年间，客家先民经历了逃灾荒、避战乱，一步一步从中原向南方迁徙，进而下南洋渡大海，散居世界各地。客家民系的形成与被称为“客家先民五次大迁徙”的过程有着重大关系。在漫长的岁月中，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客家先民凭着原有的共同血缘、地缘关系，尤其在南迁后经过长期的特殊环境的磨练和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也就是说，他们既保留了汉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基本部分，又在

某种程度上吸纳了当地土著文化习俗，在特殊环境中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千百年来，秉承中原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及优秀传统文化，客家名人辈出，精英缤纷。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影响之深广，已为世界所广泛瞩目。

由于客家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占海外华侨相当数量的客属同胞，在支持祖国现代化建设和促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起着愈益重大的作用，因而引起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客家学的研究再掀热潮。所谓客家学，就是一门研究客家民系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依循这一界定，其内涵是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客家民系的源流、社会经济、语言习俗、心理情感、民系意识等发生、发展及其演进过程，揭示这一民系的发展规律及其未来趋势。其外延则是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全面地、多方位地研究客家民系与汉民族共同体及中华民族大家庭、大文化的关系，分析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及其表现形式等，并进而科学地分析客家民系对汉民族及中华大家庭乃至整体人类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海峡客家》一书，正是循着客家学这一界定，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数十篇的文章中，分成客家渊源、客家文化、两岸客家、客家故里、客家名人、两岸客家等八个版块，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介绍，这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书中论述了客家民系的形成与界定，探讨了客家文化的传承与播衍，评述了客家土楼的建造与传奇，记述了部分客家名人的事迹与情怀，探寻了客家精神与品格，其中有不少新见解，新史料。特别是把大陆与台湾客家人的关系进行了较全面系统而又意味深长的评述，指出台湾客家人根在大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客家人对台湾的开发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海峡客家》的付梓出版，一方面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客家学研究深入开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包括漳州市客家文化研究联谊会诸多客家学研究者、爱好者在

内的众多客家学界同仁,对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进行全方位思考和探索的结果。

研究客家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必将有利于更好地研究中华民族文化,能更好地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可使新一代客家人发扬先辈的优良传统、继承先辈的优秀品德。愿漳州市客家文化研究联谊会的同仁,以及海内外广大客家学研究的热心者,再接再厉,共同努力,取得更大成绩;愿所有的客家人与所有的炎黄子孙一道,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和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的早日实现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6年8月于厦门

目 录

序言 孔永松

·客家学研究·

- 21世纪的客家学研究几点思考 孔永松 张 侃(1)
 台湾的汀州客、漳州客与福佬客问题 谢重光(13)
 “客家学热”几个主要问题的争论 韩信夫(24)
 客家·华侨·华裔·洪门 胡德平(31)
 客家精神及其核心 萧 彪(35)
 客家文化研究的时代意义 陈声华(49)

·两岸客家·

- 海峡两岸根相连 追根溯源话亲情 陈悦之(57)
 台湾客家人的垦荒事业 谢重光(61)
 台湾的客家人 曾喜诚(68)
 漳台客家文化的渊源及研究 曾一石(84)
 客家人垦台史略 魏荣章(92)
 诏安客家迁台史话 黄家祥(95)
 客家人护台御敌 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作用 刘加洪(101)

·客家渊源·

- 论中国客家民系的形成 丘权政(109)
 畬族与客家民系的形成 谢重光(126)

试述 20 世纪赣南闽西客家村落宗族社会的变迁 ...	孔永松(146)
客家民系形成与界定	萧彪 张长水(156)
湖广填川与客裔英豪	庸庸(168)
客家与中原关系刍论	王大良(175)
客家迁徙路线与河洛文化传播	谢家群(187)
漳州客家史话	王作氏(192)
加强闽台客家文化交流 大力促进中国和平统一 ·	吕清玉(195)

· 客家土楼 ·

神话般的山区民居建筑——南靖土楼	靖楼(209)
世界最大土楼:庄上客家大土楼之旅	胡艳玲(218)
平和客家生上楼概览	曾南湖(222)
诏安客家星斗楼	陈应毅(224)
探寻客家民居的建筑文化	宇生 清国(228)
土楼里的两岸情	谢华章(230)
重返土楼	张元锦(235)
客家土楼甲天下	张尧耕(238)
封闭与开放的土楼	曾纪鑫(244)

· 客家文化 ·

漫谈客家人的耕读传家传统	谢重光(261)
璀璨的客家民间文学	师丹(270)
闽台客家文化的传承与播衍	李升宝(293)
客家方言与民系形成的时间和地点	吴金夫(299)
客家源流及其文化探讨	郑鹤培 黄德骏(308)
闽西南客家山歌概论	师丹(319)
弘扬客家文化 勇攻前人“绝对”	曾志长(329)

·客家民俗·

- 多彩多姿的客家神明世界 谢重光(335)
- 台湾客家人风情 孙英龙(343)
- 平和客家人迎春的民俗风情 曾 蔚(347)
- 客家人敬教重才的文明标志
- 闽南德远堂祖庙龙旗群 张尧耕(350)

·客家故里·

- 访客家祖地——石壁 王惠廷(353)
- “世界客都”梅州春夜抒怀 萧 彪(356)
- 客家文化古镇：九峰 平 客(361)
- 客家祖地瓦子街考略 蓝赞玉 林守明(365)
- 南靖书洋客家人生活纪实 汤定宗(373)
- 天地会起源探秘简说 萧 彪(378)
- 官陂张廖氏渊源 张君燕(384)

·客家名人·

- 童小鹏与《少小离家老大回》 巩玉闽(389)
- 青史故人情
- 童小鹏撰写《风雨四十年》的情怀 张 湘(394)
- 文公正气支漳地
- 客家民系民族英雄文天祥与漳州及其他 ... 张长水(400)
- 叶亚来与吉隆坡的开辟 许永璋(406)
- 胡文虎与香港崇正总会 韩信夫(416)
- 常思家国兴亡责
- 记香港客家贤达黄石华先生 丘权政(428)
- 韩素音：自传文学中无法割断的客家情结 谭元亨(438)
- 论抗日战争期间客家英杰群像 刘大可(450)

后记

21世纪的客家学研究几点思考

——历史学的视野

◎孔永松 张侃

21世纪人类迈入新千年,人们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思考,而各门学科也不例外,各类学术研究者对自身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些新展望,以期获得新的起点。客家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新的世纪更要进行一些前瞻性思考,而这种思考可以是多角度,因为客家学如同徽学、敦煌学等,本身是一门交叉学科,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等都可以介入其中,而且就世界学术发展潮流而言,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是一必然的趋势。

但是在从不同的学科立场进行思考,并对客家学进行展望的工作中,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思考比较多,从历史学思考略嫌不够。回溯客家研究,应该说它起源于历史学,因为在本世纪20—30年代,关注客家研究的大多数学者出身于历史学,如陈寅恪、陈垣、张星、顾颉刚、洪业等,均是历史学的一代宗师,而客家学的奠基者——罗香林教授,其研究方法更完全是历史学的做法。基于此,本文拟从历史学的视野,即历史学的研究思维、研究立场对客家学在21世纪的发展作一些展望。

何为“历史学的视野”?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也可以说

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它能够延续至今,其生命力的源泉就是它有独特的视野,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这种独特的视野不同时期和历史情况下有不同的表达,尤其在新史学的历史观念下,它展示了一系列独特之处。

整体性是“历史学视野”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在历史学研究之中,研究人类活动的总体史显得越来越重要,总体史的目标是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情感、政治等因素包含在一起考虑,认为人类是一个整体,不能把这种整体的人的生活分割开来,把一些现象归结为事件,而把另一些现象视为思想,彼此毫无联系。这种孤立地看待历史的态度显然不能了解人类生活的全貌。去理解人时,应当把人及其生活的实际和时空中一切复杂关系理解为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一个社会里,不管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信仰乃至心态的最基本和最细微的表现,这一切都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1]。整体性用另外一个名词表达就是“大历史观”,有全局的思考。

长程性是“历史学”思维的另一特征。历史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各种社会因素在时间的流动中组合,按照时兴的话语,就是“社会变迁”,讲究“变”、讲究过程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的一个共识。司马迁曾说过的“通古今之变”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的“以古知今,以今知古”的“史学家的技艺”,就是事实。长程性表达出来的社会图景具有流动性,并非机械的结构组合。同时,长程性思考的“变”并不排斥“常”的追求,也就是不排斥对“规律”研究。长程性的目的就在于拉长时间,使“浑常”表现得更为明确和清晰,常与变密不可分。换言之,历史学研究也讲究结构,但不是完全静止的结构,而是动态的结构。

差异性为历史学思维一个显著特征。历史现象是多层次的,具有多面性。其他学科在研究过程中,由于注重事物的同质性,因此建立了很多模式,但是模式的同质性思考显然剥离了研究者所认为应当忽视的很多情况;而历史学所承担的任务就是从模式到

差异,分析模式中的有效条件,揭示模式的界限,“相对于其他每个学科所建立的同质整体而言,史学表现是一种相对的异质性;它同样能够使每个分析系统或分析‘层次’(经济的、社会的等)特有的界限相互联系起来”。“首先并不是使挑选好的资料系列成为可思考的资料系列,而是绝不放弃这些规律性与一些特殊性所保持的关系”。从而使“史学在规律性的边界上发挥作用时,创造了它的活动场所”,这就使其他学科所认为的法则“受到了限制,它不停地移动试图超越这一界限,同时又不断地在其他形式下重新找到这些极限”。换言之,是“使界限象征化并进而使一种超越成为可能”。^[2]

反思性的来之于历史学差异性的思考,由于历史学研究一直在突破着模式限制的条件,超越其他学科的理论极限,因而使历史学具有反思的特点,以特例反思常规,以边缘反思核心,从底层反思上层。这种特点在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被凸显,尤其在追寻着学术史的源头时,将学术研究脉络放置回历史过程中观察显得特别重要,因为通过为种历史性反思,才能完整理解一种学科研究的情景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才能清楚地知道任何一种思考和理论的创造,除了其本质是历史的产物的之外,还能清楚的知识它是怎样在历史的过程中被创造,并对历史发生影响。

二

运用历史学的视野能否展望客家学在 21 世纪的发展,首先对客家学所要完成的学术任务有一个了解。客家学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本世纪上半叶,著名学者顾颉刚、洪业、罗常培、章太炎、黄遵宪等热心提倡过或进行过一些客家研究,1933 年罗香林先生撰写《客家研究导论》,此后,客家学研究成为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客家问题研究也几乎成为当时学术界的“显学”,这是客家研究一个鼎盛时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限于国内外研究的水平,虽然罗香林最早提出“客家学”(Hakkaology),但在当

时也只能作为一个名词存在，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客家学”。194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除了香港^[5]、台湾^[4]仍进行一些客家研究之外，大陆一些业已成立的客家研究团体^[6]不复存在，以至于客家研究除了方言研究有一些成果外，其他的讨论很不充分。

从80年代开始，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和学术思考的转向，客家问题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这样的社会背景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正如陈支平教授所分析的，“80年代以后，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开始突破‘阶级斗争’理论框架的束缚，渐趋多样化。客家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注意，客家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6]。此次客家研究的复兴使一批学者和相关的机构投入到客家研究之中，针对客家的诸多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在国际客家学会的推动之下，国内外客家研究者组织一系列的研究课题，并召开多次的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应该说，客家研究此时才有机会向客家学转化的可能；因为通过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客家研究讨论的命题和研究的范围才大致确定，才使“客家学”的学科构想呼之欲出。1989年吴泽教授提出了“客家学”的学科概念并作了全面的阐述，在这些基础上，王东先生作了更为完整的说明，即所谓客家学，就是一门研究客家民系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依循这一界定，客家学的内涵应该是：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客家民系的源流、社会经济、语言习俗、心理情感、民系意识等发生、发展及其演进过程，揭示这一民系的发展规律及其未来趋势。客家学的外延则是：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全面地、多方位地研究客家民系与汉民族共同体及中华民族大家庭、大文化的关系，分析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及其诸表现形式，揭示客家民系个性特征形成的文化心理及其在文化人类学上的意义，并进而科学地分析客家民系对汉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乃至整体人类所做出的重大贡献。^[7]

这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客家学”的定义，整段的引用，是因为它较为完整地确立了客家学的研究任务，明确客家学的研

究,揭示一个演变过程中的规律;分析汉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客家民系个性特征。同时这也非常明显反映出它与历史学的视野有诸多应和之处,“全面而又系统”指的是整体性,“历史、现状和未来”是长程性,“个性特征”则是追求差异性的表示。因此从客家学目前的研究内涵及目标看,历史学的视野是完全能运用于客家学的研究的。

客家学学科口号已经提出,其任务也初步确立,但是合乎国际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完整、名副其实的“客家学”是否已经出现,或者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任何一个从事客家研究的人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在叙述中模模糊糊的,“要想使客家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客家学学科体系”^[8],“也许还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9]。从这些话的隐喻含义,可以剥离出几层意思:第一,客家学还没有根本上超越脱离本世纪20—30年代所讨论的一些命题;第二,客家学的创新还不足以建立一套新的学术规范,一些基本概念还有分歧;第三,客家学并不是独立的学科,现在还没有使各种学科为我所用,引申出一套客家学的理论,反而被成为各种学科验证它们相关理论的理论。

出现了这些问题,自然不利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不过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历史学的视野得以解决的。

三

在新近的研究中,“客家源流”一再成为谈论的焦点,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与文章^[10],并在学术的认知中,将能够质疑罗香林“南迁说”的观点视为创新,因而也引发了一系列带有感情色彩的论争。值得注意的是,罗香林提出的“客家南迁”、“客家为正宗汉族”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主要针对所谓客家非汉族的观点以及土客械斗所引发的对客家人侮辱性的言论的。那么在学术创新的过程中,将这样的学术背景视而不见,一味将罗香林视为研究的假象论敌,结果使研究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困境,

一方面要否认罗香林的推论；另一方面却延续着罗香林的谱牒辨读方法，重复着土客之争的言论，这无疑直接制约于客家研究的发展空间。

很明显，一直将“客家源流”的作为研究论题，并通过谱牒作为论据的学者，其思考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范式”——血缘论，他们反复争论“谁是客家人”，表面上看起来拉长了时间的过程，去解决起源的问题，但无论是赞同罗香林的观点或否认罗香林的观点，实际上要在宏观上虚拟一条“人种”的谱系，一条非常抽象化的谱系。

而客家作为汉民系的一支，或者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血缘的源流上可能与闽南人、江西人乃至北方人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客家人成为非客家的，也有非客家成为客家的；但是无论如何，有了客家与非客家的区分，使“成为”这一词含义深远，“成为”就是一种文化机制和文化认同。从这些考虑出发，就显示出了客家渊源应当具有的思考方式，就是将客家源流从“血缘论”转变为“文化论”，即需要讨论的是“什么是客家”和“怎样是客家”，或者说客家有自身的文化认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研究者需要探讨的是形成这种文化认同机制的历史原因或社会根源。

文化认同和文化机制的研究就不是通过阅读和分析谱牒能完成的，因为谱牒作为文化符号，它所隐含的历史意义要在具体的历史景况中解读，因而要超越“剥离式”的文献阅读，不能将可以“为我所用”的材料罗列在一起，简单地讨论问题，而是将文献与区域历史过程中结合起来，将谱牒作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放回到地方历史具体演变中，将其与地方的其他文化符号看成有机的组成，从而整体性的历史学思维下来剖析当时的人们如何不同的人文与自然条件下，在各种历史力量的综合作用下，进行不同的主观意义的文化建构，进而形成了“客家认同”的边界。引申这种文化认同机制，就会扩大客家的空间，就可以将一种暇想的客家与周边族群的清晰的边界的抹去，而是引入一种更为灵活，更富有弹性的客家与周边族群的互动关系，看到族群边界的飘动和不

确定性。而这种边界只有放置于整体的历史过程中才能清晰,才会明确,或者就可能揭示出这种边界对于某一群体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要想辨别边界,理清文化认同,就要对地方历史过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目前的情况看,对于客家人生存的各个区域地方历史研究还没有很好的展开,如果有的话,只是一种社会经济史的简单勾勒,而缺乏总体的研究和一个多层次的历史过程。基于这样的分析,展望 21 世纪的客家学研究,就可以大致寻找值得继续探讨的命题,比如研究各个客家聚居地区的社会文化史,将各种社会结构、社会网络进行有机的叠加,建构一种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相结合的历史图景;再加研究客家、闽人、粤人在长期繁衍发展过程中接触和互动的历史,以及不同时期接触和互动情况的差异及其原因,等等。一旦这些整体性的研究成熟,那么客家人在历史过程何以成为客家,将会有有一个具体的解释,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谱系说明,将可以重构源流中的一些根本机制问题。

四

在近 10 年的客家研究中,学者们十分注重地方文化的研究,比如民间信仰、庙会体系、宗教组织。而这些民间文化现象在文献上比较少涉及,因此,客家研究者在进行多学科结合时,在方法上引入了人类学家常用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应该说这种方法对于客家社会的个案研究是非常有效的,以劳格文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及其动力”研究计划比较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学术意图,这也可以说是客家研究的一种创新,纠正以前客家研究关注宏观而对细微考察不够的误区。从现实的情况看,田野调查成为研究客家的必要方法已经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共识。

“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研究异文化或他者的一种手段,其运用上有一定规范,即一定是参加到被调查对象生活中去,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要站在被调查者立场上思考问题,观察问题。那么这种方法进行客家研究,就要去建构一些社区,因为只有建构

出社区,才能确定观察对象,才能有人类学的立场。考察已有的、通过田野调查方法获得客家研究成果,大致可以说是体现了这种人类学的精神。他们不是以乡镇为社区单位^[1],就是以村落为社区单位^[2],而“每位工作者,不是去抄别人的文字资料,而是真的走出家门访查乡村中的老人,以了解过去的一些事情是如何做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因此,他们带回来的每一个事实是不可替代的,也是极为宝贵的”。所谓“每一个事实”,无疑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一个特例”和“一个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田野调查”只是客家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全部方法,尤其在进行地方性知识的采集时,历史学的视野显得特别重要。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学视野,现有的“田野调查”缺陷已经出现。在一系列田野材料中,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无联系的独立社区或独立宗族或独立的信仰系统,它们的运行似乎是自给自足的,不存在外界因素的附加。田野调查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功能主义和非历史倾向,于是以点带面、以偏盖全的诊断时常出现。产生的问题是:田野显示了一个无国家的社区,抑或无传承的信仰,或无联系的庙会。

事实难道真的如此,显然不是。地方系统在表层上表现为异化的同时,它与大历史背景是连接在一起,成为整个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具有长程性,从而另一个层面上表现出一体化和制度化。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体制之外的产物,而与国家体制一体的,比如国家赋税制度、户籍制度、里甲制度都是地方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科举制度、儒家观念则通过科举制度无处不在,经济发展中的全国市场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地区。至于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各种仪式背后的隐喻就是国家制度的扩张。按照有些学者的描述:“对待民间的信仰和公共仪式大都不把它们看作是对由物质生活的经济逻辑所建构的社会秩序的反映,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同时把地域与国家整合为文化体系、复杂的、多层次的精细化”^[3]。从这些思考出发,客家学的“田野调查”显然要将历史学长程性思维带入,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对于

这个问题,徐正光先生曾有明确认识,当他将客家学的研究与国际汉学相对接与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中国地方文化问题相联系,认为客家学研究的某些方面是“延续学术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动态的探讨”时,特别将劳格文的研究与弗利德曼的华南宗族研究、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研究并列看待,实际已经表现出了这样的关怀。^[14]因为弗利德曼研究的虽然研究中华帝国的一个边远角落,但并没有忽略影响宗族发展的国家力量因素^[15];施坚雅更是从农村的地域市场出发,描述了中国历史的结构变动^[16]。

经过如此的批评,“田野研究”的方法及其在研究上出现的类似于“民族志”写作文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将来在研究过程中加入历史学长程性视野的考察,可以预设,在 21 世纪的客家学田野调查中,学者将要关注的是客家民间社会文化与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间的关联,以及国家力量是以何种机制向客家社会渗透的;还有关注地方性的势力如何在国家、地方的权力结构中充当角色,“对村落的考察,我们可探索民众日常生活的真实,也可以理解村落在特定时下以何种方式与社会和国家之间互动,何以成为社会和国家的缩影”^[17]。

五

学科能够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对学科体系有反思,对学科的概念有不断的更正,在 21 世纪的客家学发展中,对学术史理性思考将是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只有通过学术史重新理解,才会获得新的研究范式。

“范式”是库恩在 1962 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库恩认为,科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科学共同体”的范围内酝酿成熟并表述出来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定的科学共同体依据某种“共同的因素”所进行的“专业活动”,“直观地看,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些共同体具有